

为了可爱的中国

陈家鹦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纪实文学

为了可爱的中国

中共弋阳县委党史办 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之光文丛/卜一 主编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ISBN7-5059-3020-6

I ··· II ··· III ·文学—中国—当代 IV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765 号

书 名	为了可爱的中国
作 者	陈家鹦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军
责任印制	卜 一
印 刷	《运河晚报》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4
印 数	1—2050 册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9-3020-6/I·1546
定 价	12.80 元(全套 248 元)

序

● 汪东兴

最近,陈家鹏同志将自己近十几年来发表在各级各类刊物上的有关党史体裁方面的纪实作品,进行收集整理,在中共弋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的支持下编辑出版,书名为《为了可爱的中国》。他曾经把这个想法告诉过我,也采访过我,并将部分书稿寄给我看,希望我能为此书作序。

我抽了一点时间,粗看了部分书稿。本书大部分内容是关于方志敏烈士的,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认为作者的写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力求尊重历史,基本上反映了书中人物和事件的原貌。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是一部教科书,研究历史和反映历史应该实事求是。

我希望他继续努力,立足革命老区,深入生活,调查研究,不断发掘我们革命老区有关党史、革命史的丰富史料,不断写出好作品。

《为了可爱的中国》能够出版,不仅仅是作者对自己多年来从事党史题材纪实写作的一次总结,也可以使读者在了解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同时,获得某些教育和启迪。

2000年6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汪东兴
方志敏漂流上海滩	(1)
以身殉志 不亦伟乎	(9)
——记毛泽东与方志敏	
风雪怀玉山	(18)
有这样一对囚友	(24)
——记方志敏与胡逸民	
为方志敏传送狱中文稿的一对恋人	(37)
迟到的葬礼	(50)
——记方志敏遗骨从发掘到安葬	
毛主席称他“邵大哥”	(58)
魂归塔山	(75)
——记吴克华与塔山阻击战	
王开湘和长征途中的红四团	(86)
红星在召唤	(114)
——国民党 68 军军部及其 81 师在弋阳投诚纪实	
后记	(132)

方志敏漂流上海滩

1922年7月初,一个闷热的夜晚。

喧闹一天的上海法租界似乎刚刚安静些。在贝蒂磨路(今河南路)巨鹿里一个低矮狭小的亭子间里,一位眉清目秀,但脸部线条棱角分明的青年正伏在小小的写字台上奋笔疾书。汗衫湿了也全然不顾,只听见那支腾龙舞凤的笔在纸上沙沙飞走。一会儿,几行潇洒俊秀的行草出现在信笺上:

“读书不成,只为家贫,但因贫而无受教育机会的人,在中国何止千万?无论如何,我是不会相信基督教的。现在,我也不愿再读那些无意义的书,我要实际的去做革命工作了……”

闷热久坐,使人感到头脑昏胀。他将笔一丢,“霍”地站起来,要伸个懒腰舒动筋骨。猛然间他意识到自己身居低矮斗室,由不得他放肆。由于身材颇长,他只得略略屈腿,勉强完成“伸懒腰”的全过程。

他探头窗外,贪婪地吸了几口户外的空气,品味着几许清凉。面对着满天繁星,他心驰神往……

此人正是方志敏。他孤身一人由九江飘流到上海,先在江西会馆混了两晚,今天刚找到他的同学罗漫(原名洪宏义),于是便在这个亭子间里落了脚。罗漫是方志敏在南昌时的同学。1921年春,他们领头在江西甲种工业学校掀起学潮,揭露校方的腐败和反动,结果遭到校长的镇压和报复,方志敏、罗漫等4名同学被学校除名。以后方志敏到九江考进南伟烈学校(就读于中学部),而罗漫则飘泊至上海,后经一位同乡贤达介绍到报社做校对。人生何处不相逢,一年多后他们又异地聚首了。

方志敏此刻是在给九江的同学、一位校园“读书会”的好友写信。

明静的夜空已将他的思绪带到九江甘棠湖畔——

南伟烈是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每个星期都要做徒耗精力的“礼拜”，实在没意思。方志敏背着校方，与一些进步学生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他们相互关照，常常就在众人唧唧哇哇诵念圣经，虔诚地做礼拜时，暗地里翻阅英文版《资本论入门》、《共产党宣言》及《先驱报》等进步书刊。为此方志敏多次受到校方警告。方志敏对此不以为然，“越轨”行为愈演愈烈，竟然走出校门联合其他学校进步力量，举行爱国反帝活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这些情况引起了九江北洋军阀反动势力的关注和仇视，他们指使学校开除方志敏，而校方却担心开除会触发更大的学潮，因而一直犹豫不决。1922年6月底，就在学校尚未作出“开除”决定时，方志敏便结束了在此近一年半的学习生活，主动宣布退学了。

方志敏刚离学校，一位读书会的学友转告他，校方很赏识他的天资和胆略，愿意改变开除方志敏的打算，希望他仍回校就读，并答应让他享受免交学膳费的优待，但附有条件，要方志敏放弃宣传社会主义和鼓动革命等活动，皈依基督，虔诚信教。可方志敏断然拒绝了这一切，于是满怀激情地写了上述那段文字。

“志敏，不早了。该睡了。”罗漫提醒陷入沉思的方志敏。

“你说，我们明天可以去找《先驱报》吗？”方志敏却依照自己的思路答话。

“哎呀！不是说好了明天要去找那个牧师吗？怎么又——快别胡思乱想！民以食为天，先得考虑做事、吃饭。”罗漫善意地警告道。

“哦……”

南伟烈学校一位同情方志敏的校长，托人转给方志敏一封信，介绍他到上海可以去找一位牧师，说此人可以帮助他找到职业。在同学好友的怂恿下，方志敏决定去试试。

牧师住在一所美以美会办的医院花园里。那幢两层楼的精美小洋房，早给那红花绿草包围了；矮矮的深绿的冬青树，在那条直连房门的路两旁，一排排地站着；尤其是门口栽的两株白梔子花，放出阵阵馥郁的清香。

方志敏谨慎地按了门铃，仆人立即出来开门。他说明要见牧师，仆人便引他到一间客室里候着。他向周围一望，华丽的装饰，雅洁的布置，纯粹是一户基督教化的家庭。

好久，那位 40 余岁身穿一身崭新西装的牧师终于踱着方步走出来，对着方志敏惊愕地问道：“啊——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我是从九江南伟烈来的，校长介绍我到此。”方志敏从衣袋里拿出那封介绍信，郑重地递给牧师。牧师一面接着，一面说：“那么，请坐吧！”

牧师看后，坐在安乐椅上斟酌句地开言：“啊，原来是谋事，那可难呐！”

“我没有什么奢望，就想能有个够我生活的工作就满意了，我还想一面读点书……”

牧师接连摇头：“很难，很难！此地找事，全靠路子，光有本领也不成。那学校不错，为什么不好好读书……”

“唔，那学校好是好……”方志敏实在不想曲意迎合，但一时很难找出适合的话语应付。

牧师一边交谈，一边开始注视着方志敏的那一身乡式打扮，接着突然发问：“你在这里有亲戚吗？身边带了多少钱？”

“没有亲戚，只有几个同乡朋友，钱做盘缠早用光了。”

“哦，在上海滩上想混碗饭吃不容易呀，还是早日回家乡去吧！”牧师淡淡地说道，显然没有闲心帮助眼前这位素不相识的青年。

方志敏如坐针毡。牧师却取出小剪，自顾专心修剪指甲，脸上显出不耐烦的神色。会客室里出现一阵难堪的沉默。方志敏知道再坐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起身告辞：“那我就走了。对不起，打扰您了！”

牧师慢慢起身，似乎还想寒暄两句。可方志敏头也没回，已走到门口。

谋事不成的困窘，从此在方志敏的心头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第二天，方志敏暂时忘记了一切不愉快的事，怀着急切的心情寻《先驱报》报社。此报创办于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

1922年施存统主编该报，热情宣传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讨论青年团的建团内容，常向读者介绍苏联建设成就。这份报纸在进步青年中影响很大，方志敏在九江时就特别喜欢看。当时校方对进步报刊查封很紧，方志敏每次都是通过进出校园的洗衣工才获得此报。这次到了上海，怎能不去造访？

方志敏很顺利地找到了《先驱报》报社，使他更感到兴奋的是在报社遇到赣籍知音。此人就是赵醒依，他原名性和，江西南丰人，少年贫困失学。他开始流浪长沙、汉口等地，后漂泊至上海，白天叫卖报纸，晚上到戏院“跑龙套”。现经朋友介绍到一家店铺当伙计，这时开始与社会进步力量接触。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他便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方志敏结识时他已转为中共党员。赵以卖报为幌子，常出入于进步报社和团体从事革命活动。

此后，方志敏经常跑《先驱报》社，又先后在这里结识了共产党人恽代英和向警予。恽是江苏武进人，这时已是川南师范学校的校长。这年夏天他趁为学校办事的机会赴沪，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向警予更是一位女中豪杰。她于4月分娩，未满月就四处奔波，方志敏结识她时，她正忙着筹备中共“三大”召开。这些共产党先驱者坚定的政治信仰及忘我的奋斗热情给方志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方志敏常将他的感受向赵醒依吐露。

一次，方志敏对赵醒依说：“我十分赞同《先驱报》的宗旨。我们每个青年都如那些热情的共产党人那样身体力行，中国就大有希望了。”

“是啊，你说得太好了！志敏，我介绍你参加CY，怎么样？”赵试探道。

“行，我们日后回江西也像他们那样干。”

不久，方志敏就由赵介绍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方志敏初到上海谋事不成、就学无门，整日呆在鸽子笼一般的亭子间，实在憋得难受，于是常与朋友逛街游园，然而所见所闻，常留下不愉快的印象。一次，他与罗漫等几个朋友来到外滩黄浦公园，谁知公园门口禁牌上竟赫然醒目地写着“穿便服的华人不准入内！”“狗不

准入内!”这是什么意思?还不是明摆着的吗!方志敏顿时感到自己蒙受了奇耻大辱,一股热血上涌。他与友人游兴全无,当即愤然而归。

笃笃笃,这天傍晚刚吃过晚饭就有人敲门。罗漫连忙开门。

“哟,先兆兄,你怎么也摸到这里来了?”方志敏这才高兴起来。

“别提了——”来人徐先兆顾不得寒暄,便愤然叙述道,“我找不着你这贝蒂麋路巨鹿里,就向一个法国巡捕打听。可那巡捕不知在哪里受了气,对着过路人恶狠狠地瞪眼睛。我刚刚张口问,他一句话没说,扬起巴掌就打我一耳光。这些帝国主义租界真野蛮,太欺负人了。”

“这些外国佬狗仗人势!看到他们躲得远远的才好。”罗漫也气愤地抨击道。

“先兆兄,来,先坐下。唉,睁开眼气人的事太多了……”方志敏想劝慰朋友消消气,可说着说着又想起游公园的事,自己也激动起来,“在上海,最好是躲在鸽子笼不出去,倒可以眼不见为净。倘若出去走一走,准会憋一肚子气。我们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忍心自己的同胞遭受蹂躏。国家的出路在哪里?我们青年的出路在哪里?”

大家正在发泄心头苦闷愤恨之时,赵醒依也赴约赶到。方志敏忙为徐先兆与赵醒依介绍,“他叫徐先兆。是我家乡邻县铅山人,在省里编《大江报》。”

赵醒依从衣袋里掏出一本杂志说:“大家尽发牢骚有什么用!来,我今天特意带来这期《先驱报》,给你们看看——”大家立刻围拢过来听他指点,“中共中央第一次提出对于时局的主张,批判‘恢复国会’、‘废督裁军’、‘联省自治’,提出民主主义联合战线,共同向帝国主义势力坚决斗争。这个主张怎么样?”

“好得很!”方志敏立即表示赞同拥护,其他朋友也认为很好。赵醒依仍对大家侃侃而谈:“我们的祖国在黑暗中孕育着光明。这光明要靠我们去争取。我们要唤醒民众,团结起来和反动势力作斗争……”

7月中旬,方志敏随罗漫在上海《民国日报》找到一份校对工作。

其实，方志敏早就与这家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海《民国日报》开始是邵力子于1916年为反袁世凯而创办的。不久邵力子又在该报上辟《觉悟》副刊，并兼任主编，陈望道与施存统（复亮）都是《觉悟》的编辑。《觉悟》副刊在我国早期传播马列主义时影响较大，成了许多进步青年的良师益友。方志敏早于1920年在南昌“甲工”读书时就是上海《民国日报》的热心读者。他尤其喜欢《觉悟》栏目中的文学作品，往往有感而发投书报馆，提出问题或申述自己的见解。由于方志敏思想活跃、剖析独到、文笔流畅，引起了邵力子的注意。

有一次《觉悟》栏登载了一篇题为《捉贼》的小说，描写了学生吊打小偷的情景。这一现实在方志敏思想上引起了震动，便投书报馆发表了针砭时弊的见解：“小偷是不是算顶坏的？比他坏的，触目皆是。军阀、政客、资本家、地主，哪一个不是操戈矛的大盗？为什么大盗逍遥自在，受人敬礼；而小偷却在此被吊起敲打？”主编邵力子看了方的信，颇有感触，他亲笔复函，赞扬方志敏见解深刻，指出了社会的本质和病根。并希望他常写些诗文，揭露社会的黑暗，唤起民众。此后，方志敏便陆续向上海《民国日报》寄稿件。其中，方志敏在九江南伟烈写的《哭声》、《呕血》等白话诗均发表在该报的《觉悟》副刊上。

这天，罗漫陪同方志敏到报馆拜会邵力子。邵力子对方志敏的来访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关切地问长问短。当邵力子了解到方志敏在上海举目无亲，临时挤在同学的亭子间栖身，便热情地说：“一个大学生想在上海谋个小学教员的位置都很难。我看暂留我们报馆打杂吧！”

“好，好，太谢谢你了！”方志敏很感动。

“不过——”邵力子笑咪咪地望着方志敏。

“难道邵先生还有什么条件吗？”方志敏有些惶惑。

“不会为难你的！”邵确实喜欢面前这位朴实而具才华的青年，“我的条件就是要你继续为我报副刊提供稿件，为穷苦人呐喊。”

“好，好。”方志敏连声应允，“学生拙作，还请先生多指教。”

承蒙邵力子的器重和热情，方志敏一度落脚《民国日报》报馆，并

通过邵力子、恽代英到上海大学旁听。他与罗漫晚上在报社作校对，白天到学校听讲学。他俩还听了邵力子主讲的中文课。那时，邵力子的家住在离报馆不远的南洋桥三益里。邵力子曾挽留方志敏在家中小住数日，让方志敏与其在复旦大学就读的儿子同室。

一天，方志敏拿着自己刚写好的小说稿兴冲冲地来到邵家，念给邵力子的家人听，并征询给作品定个什么题目为好？后来稿子送到邵力子手上，便将此作取名《谋事》。几天后，方志敏这篇以自己初到上海找牧师而遭冷遇的生活经历为素材的小说便赫然刊载于《民国日报》的《觉悟》中。邵力子还亲自撰写了《随感录》，对作品作了十分肯定的评价。

第二年(1923)，《谋事》同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享有盛名的作家作品一起被选进上海小说研究所编印的《小说年鉴》里，并有按语赞此作“是拿贫人的血泪涂成的作品”。

方志敏一贫寒学士，只身漂泊于十里洋场，早已行囊空空。他干过一阵子校对，月薪20元，但只能维持糊口。刚到上海时，他曾投书回家，要求家庭接济。

方志敏的堂兄弟方志纯得知情况，十分着急，便瞒着父母变卖田产，凑集了50元，后又在乡间收集了百余斤好茶叶，打算到上海卖个好价钱。方志纯离开家乡弋阳，取道九江经水路到上海，已是8月下旬了。

难得出远门的方志纯一来到“花花世界”就上当。他一路上千辛万苦带到上海的百余斤茶叶竟被人骗去，方氏兄弟手头更加拮据。

这时，赵醒依以党组织名义委派方志敏先行，离沪返赣从事发动江西的革命活动。方志纯只在上海逗留四五天，便买了船票随方志敏经九江回南昌。

1922年8月29日。一声鸣笛，江轮启动。方志敏与赵醒依挥手致意，依依不舍。方志敏望着渐渐远离的“十里洋场”高楼大厦，耳畔都市的喧嚣也渐渐被江浪拍击声淹没，可他的心却无法平静。两个月的亲身经历，使他对被人称为“富人的天堂”，“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有深刻的感受，于是诗情澎湃，难以自禁：

血……肉

伟大壮丽的房屋,用什么建筑成功的呢?

血啊,肉啊!

铺了白布的餐桌上,摆着的大盆子小碟

子里,是些什么呢?

血啊,肉啊!

藏得重压压的铁箱皮箱,

里面是些什么呢?

血啊,肉啊!

1922年8月29日吴淞轮次

真是愤怒出诗人。后来此作发表于1923年1月号的《新江西》。

以身殉志 不亦伟乎

——记毛泽东与方志敏

1935年8月。方志敏在南昌惨遭蒋介石杀害，年仅36岁。毛泽东得知噩耗十分悲痛。全国解放后，他仍常常叨念着这位杰出的闽浙皖赣根据地创始人、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生前撰文回忆道：“毛主席多次对我说过：方志敏牺牲了，很可惜，是王明路线断送了他……”汪东兴近年也撰文说，毛主席常常怀念方志敏，称赞他是“有勇气、有志气而且是很有才华的共产党人，他死的伟大，我很怀念他。”

毛泽东对方志敏的情感何以如此深沉笃厚？翻开历史卷册，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俩不仅仅是一般志同道合的共产党人，而且每当革命的转折关头都具有类同的远见卓识。在大革命的浪潮中，在土地革命的烽烟中，他们志相同，心相通，在共同探索奋斗中锻铸了他们的挚情厚谊……

1926年春。方志敏乘上海至广州的航海客轮，兴冲冲地前去赴广东省参加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他早早地到了广州，方志敏一下客轮，就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是全新的感受。他觉得这里到处都显得生气勃勃、热气腾腾。他从内心感叹道：这里到底是革命策源地。

方志敏在他的遗著中曾作了这样的描述：“当轮船驶进虎门要塞时，看到环要塞的一道粉白围墙上，写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十个大字，精神为之一振！到了广州，看到各处所贴的崭新的革命标语，省港罢工工人的坚决斗争，各地革命农民代表的踊跃赴会与革命军人的和蔼可亲，这些情形，都使我感到愉快。”

5月1日，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如期举行，会址就在被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辟为大课堂的番禺学宫。彭湃，这位广东省农民

运动的杰出领导人,被人们誉为“农民大王”的是举办这次大会的中心人物,显然最忙。此外,毛泽东、邓中夏、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人也出席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

5月3日,毛泽东同志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了开学典礼。方志敏率赣籍学员黄镇中等人又参加了这个庆典。

开学典礼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伯渠主持,所长毛泽东报告了农讲所筹备经过和招生情形。农讲所教务主任萧楚女等人出席典礼,另外还有谭延恺、何香凝、郭沫若、彭湃、彭述之等分别代表某一方面也参加了开学典礼。

方志敏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在他看来,他的广州之行是参加了国民革命以来第一次群星璀璨、精英荟萃的盛会。

就在这一系列繁忙而又令人兴奋的活动中,方志敏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以及彭湃、阮啸仙等一批来自各地从事农民运动实践的领袖人物。方志敏寻觅到一个机会,在农讲所拜访了他渴慕已久的毛泽东。

“润之先生,我来自江西,叫方志敏。我也是搞农运工作的,这次到广州主要是应邀来参加广东省农代会的。”

“志敏同志,我听人说了。你在江西的职务是农民部长,不错吧?你们不是也选派一些同志到农讲所学习吗?”

“是的,这位同志就是我们选派的学员,名叫黄镇中。他还是我的同乡、同学哩!”说着,方志敏把随同一道来造访的第六期农讲所学员、在家乡弋阳高小读书的同窗好友黄镇中介绍给毛泽东。

方志敏早就听说毛泽东对农运工作特别热心,想不到他对同志也很热情,初见面就让人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此时毛泽东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运委员,还身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眼下又出任广州第六届农讲所所长,工作十分繁忙。可每当有人找他谈“农运”工作,他几乎是来者不拒,而且精神昂扬,情感也是那么专注。

方志敏向毛泽东倾诉了自己的感受:“参加了广东农代会,我感到收获很大。尤其彭湃同志的报告具体、生动,我算开了眼界,向他

学了不少农民运动的工作方法，他真不愧是‘农民大王’！”

“是啊！我们就是要把广东的农民运动的经验宣传推广到全国各地去。全中国一个农民大王不够啊！你回去要做江西的农民大王，日后我回去做湖南的农民大王，我们‘大王’多了，国民革命不就闹得轰轰烈烈了嘛！你说是吗？”

方志敏觉得和毛泽东谈话十分投机，他讲问题往往比别人深刻，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工作方法，而且还不乏幽默。毛方二人谈论的中心自然是中国的农民问题，毛泽东很鲜明地阐述他的观点：“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如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法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就是农民革命。”

方志敏此时特别兴奋，他也结合江西的农运开展情况来印证农民问题之重要，可他每谈到激动之时便满脸潮红，憋不住一阵急促的咳嗽。毛泽东似乎有所觉察，关切地问道：“怎么，身体不大好？”

坐在一旁很少吭声的黄镇中答道：“志敏在少年时代就染了肺病，一直没治好。”

“哦，我看你高高瘦瘦很单薄的身子，就知道身体不算好。可要注意，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毛泽东十分关切地说道。时间真快！繁忙的事务和活动由不得他们对共同关注的问题作更深的交谈，方志敏只好带着意犹未尽的遗憾，匆匆地告辞了。

方志敏在广州的十几天里，他还与劳、农两大会（即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广州召开）的代表到国民政府请愿出师北伐，还到省港罢工委员会、石井兵工厂等处参观访问。

方志敏在离别广州前，曾向毛泽东表示愿在羊城再逗留一些时日，希望能系统地听毛的授课。毛泽东则劝告他不要太急，首先要调养好身体；再说，江西的农运工作也十分需要方尽快回赣。

方志敏带着对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深深的眷恋，匆匆踏上归程。

连日的奔走劳累与过度的兴奋，方志敏的积疾肺病复发了。就在他返回江西途经上海时体温已升到摄氏41度，几濒于死。幸亏得

到中国济难会的帮助,在上海医院治疗了两个月,症状减轻,后转到庐山牯岭普仁医院继续治疗,病情才得以好转。

方志敏在他的遗著中回忆这段经历时曾写道:“满望回到江西,大大的作一番运动,哪知刚到上海,又吐血来了,这次肺病的大发,热度升到摄氏表四十一度,几至于死。”

1926年10月北伐军开始进入江西。中共中央从北京、上海派了一批干部支援江西工作。这时,大病初愈的方志敏再也不肯静心养病了。他遵照党的指示,急忙回到南昌,以激昂的姿态,迎接大革命的高潮到来。

为了配合快速推进北伐战争,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讲所在9月间结束。学员们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毛泽东通过开办农讲所卓有成效的实践以及他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一系列既有理论高度又具独创见解的文章发表,逐渐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不久,毛泽东便出任中共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11月上旬,毛离开广州,乘船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方志敏与毛泽东第二次接触是于1926年11月下旬在南昌。

《毛泽东年谱》载:“11月下旬,离上海经南昌赴武汉。二十六日晚在南昌会晤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商谈在武昌开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问题。……二十九日江西临时政法委员会作出决定:江西选派一百五十名学员送武昌农讲所,并负担经费一万二千元。”

这段文字未提及毛方二人是否面晤,是编者尚未发现确凿的文献依据,抑或其他什么原因?不过,《方志敏生平年表》却载录:“十一月底,接待从上海抵达南昌的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完全赞同毛泽东当时提出的在武汉举办‘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倡议。”

由于11月初北伐军攻占南昌城,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由秘密转为公开。方志敏继续担任省党部执委兼农民部长。此时他一方面忙于委派一批农运特派员,分赴各交通沿线指导农运,支援北伐军东进,同时在忙于成立全省农协筹备处,筹划即将召开的省农民代表大会。就在这时,方志敏接待了毛泽东。方志敏在省农协筹备处(南昌市百